

紅樓閨閣之夢

臺灣作家，旅居瑞典 | 陳文芬

2000年1月10日只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一個瑞典人在冰湖上滑冰，冰湖破了洞，那人摔進冰湖裏險些兒就往上帝那兒報到，從湖裏爬了起來的人兒也有些年歲了，一霎那間他感謝上天的恩典要是他活得成一定要翻譯《紅樓夢》！

復活上岸的人名喚白山人。「山人」（Bergman）一個普通的姓氏卻有兩個電影名人導演柏格曼、女明星英格麗·褒曼，他們都姓 Bergman 意譯是「山人」。「白山人」（Pär Bergman）

的漢名取的好。他曾經到歐洲文學最鼎盛的法國、義大利拿到文學博士，在義大利他得知《紅樓夢》在世界文學的地位，回瑞典他找著馬悅然老師學習漢語，追隨馬悅然的過程他體悟了《紅樓夢》確實是世界最美麗的一部文學作品，他在冰湖裏決心翻譯《紅樓夢》瑞典文的譯本，2011年他在斯京遠東圖書館發表五部譯本，他的老師馬悅然推薦白山人榮獲2011年皇家科學院翻譯大獎。

描述白山人翻譯紅樓夢以前，應該談一談高本漢、馬悅然跟《紅樓夢》之間的小故事。民國大學者胡適1927年發表的論文肯定同八十回是曹雪芹寫的，一般學者接受胡適的看法，但不能肯定後四十回是高鶚所寫的。1952年高本漢在一篇文章當中比較八十回與四十回的「三十八個語法形式」，他發現那三十八個的語法使用於前後版本相當吻合，高本漢以此做為依據判斷《紅樓夢》是同一個人寫的，要是兩個人寫出這部書只能說他們出身的方言系統完全相同。

高本漢的看法是不是受到「紅學」學者的足夠重視這不管重要。高本漢評價《紅樓夢》指出，這部書寫作藝術與技巧就像英國文學名著《傲慢與偏見》的作者珍·奧斯汀一樣，一部十八世紀文學作品其明快爽脆的語言完全就跟現代文學作品相同叫人著迷。高本漢給予《紅樓夢》高度評價，可惜遲遲沒有瑞典語譯本令高雅之堂的知識份子明白這個久存於世的事實。一九六〇年代瑞典學院院士 Artur Lundkvist 回答了為甚麼中文作家還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問題說：「中國小說藝術據他看還沒趕得上西方的小說！」馬悅然一聽說此事生氣了，馬上寫文章發表在瑞典最大的報紙指出中國早就有一部《紅樓夢》比西方所有最好的小說好過百千倍。

馬悅然認為中國文學四大名著當中以《金瓶梅》的語言最接近現代的語彙，《金瓶梅》的文字魅力對他來說更甚於《紅樓夢》。可惜瑞典有人從英語或德語的譯本翻譯成瑞典文，不巧



馬悅然與他的學生白山人（翻譯紅樓夢的譯者）在2011年2月1日的發表會，遠東圖書館合影。（攝影／陳文芬）

那還是一個差勁極了的譯本，馬悅然對此譯本批評甚多，受此譯本影響，他繞過了《金瓶梅》，1974年翻譯完成《水滸傳》瑞典語版四大冊、1994年翻譯完成《西遊記》五大冊。他自認此生最佳譯作為《西遊記》當中對於儒釋道的註解寫得很詳細，讀者能藉此了解許多中國文化的知識。近年瑞典給中學生的好書出版計劃當中，曾選擇馬悅然翻譯沈從文的《邊城》以及《西遊記》的第一冊給中學生閱讀指定版本。1974年的《水滸傳》受到北歐讀者歡迎暢銷五萬五千套為古典文學譯作在瑞典的一則出版傳奇。

我跟白山人先生有幾面之緣，他穿著樸素不時出現在馬悅然演講的會場。他靜靜的站在一旁，面目總含有學生見到老師那種很安心的神情。每年聖誕節以前收到白山人一封書信，打印寫滿兩面的文字，報告這一年他讀過哪一些書籍，家裡的人做了什麼有意思的事情，信底總畫著一個虔誠拜倒的讀書人，我從這個畫像認得了白山人的來信。

白山人1933年出生，只比他的漢學老師馬悅然年輕九歲，生長在瑞典最為古老的瓦斯泰納（Vadstena）小鎮。我遲遲於2014年夏天才拜訪這個古鎮，當時即震撼小鎮有如童話國度的風采，更驚訝於小鎮八、九百年來受到一貴族修女碧姬塔帶來的深遠的影響。這是一個古代的女性主義城市，碧姬塔從小有通靈的能力，她十一歲母親死了，單身的父親認為自己不能養一個女兒，送她去親戚家長成，隨後就給她說了一個人家，出嫁時還未成年，碧姬塔說服新郎等她長大才行洞房之禮，她信仰虔誠，丈夫就跟著她過著居士的生活，與丈夫生養八個子女以後，夫婦遠赴西班牙朝聖，在法國途中重病，這時她看見法國的神祇出現允諾他們夫婦可安然返家，她的丈夫果真於回家以後才蒙主寵召，碧姬塔隨即散盡家產出家去了。碧姬塔有多次跟天主對話的通靈經驗，精通拉丁文的教士將她通靈的故事寫成書，於是她成為歐洲重要的宗教作家遠赴羅馬教廷受到重視，此後她貢獻給瓦斯泰納故鄉一座以她為名的大修道院，她畫了建築草圖，日後又建造了教堂，整個古鎮就以瓦斯泰納的城堡以及碧姬塔遺留的修道院為基礎，維持近千年的古堡傳奇。夏天我們開車從斯京往南三百公里到瓦斯泰納看現代歌劇，歌劇就在古堡裏演出，古堡大廳曾是瓦薩國王的太子居住之地，碧姬塔修女的事蹟則早於瓦薩王朝，瑞典王國建國大業是由瓦薩王朝建立而成，鞏固王權的一大特色就是削弱了瑞典境內的天主教財產，宗教產權收歸國有，自瓦薩王朝以來瑞典堅決信奉基督路德教派為國教，是以天主教修道院不多，瓦斯泰納小鎮同時擁有瓦薩、天主教象徵性的古建築，堪稱是瑞典最偉大的小鎮之一。

碧姬塔的修道院跟古堡的建築規模宏偉壯觀，碧姬塔與上帝通靈對話的書籍是出版歷史的古文獻，書寫極精美，目前皇家人文學院有一組研究員的任務要從拉丁文翻譯瑞典文。修道院的酒窖成為一家遠近馳名的修道院飯店，從古堡看完歌劇出來晚上接近十點夏天的落日淡淡的粉紅霞光照在大海，沿著堤岸平直的走向修道院的方向，海邊的樹林散落著夏夜談話的人群，海裡頭還有一群家族老小游泳。

讀者可能想問，瓦斯泰納小鎮跟白山人翻譯《紅樓夢》有關係麼？《紅樓夢》五部磚頭一般大，裝幀古意盎然的書籍，從2005-2011年每年出版一部終於完成時，我曾跟白山人有過一次

很詳細的書信筆談。他自我介紹時頗以在美麗的古鎮成長為傲。我相信一個瓦斯泰納的居民遊歷歐土最後卻選擇翻譯中國的《紅樓夢》作為畢生的志業不是偶然發生的，就像高本漢欣賞《聊齋》把《聊齋》的狐狸精介紹傳授給他的學生捷克的漢學家普實克，就像馬悅然翻譯《西遊記》他們師徒兩人著迷於古典幻覺妖魔的力量，那是因為高本漢、馬悅然都成長於延雪平，那兒是所有瑞典奇幻童話故事的原鄉森林。

白山人於高中時期學習英語、法語、德語、拉丁文、希臘文，還有本國語言瑞典語，考取烏普撒拉大學學習歷史、政學、教育學、文學、北歐語言（瑞典語，丹麥語，古代冰島語，挪威語）、法語和義大利語，白山人告訴我：「五十年代末，我在巴黎學了兩年，也在義大利學習兩年。我考了兩個博士文學史、法國文學，我的文學史的論文是關於《義大利與法國第一次大戰之前未來派的詩歌》，1962年我考了這個博士以後，我就能在大學得到副教授的位子，可是我沒有去申請，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高中任教，1962年開始在高中教瑞典語跟文學。以後我才去跟馬悅然學中文，1987-1998我在高中也教中文，直到退休。」瑞典的高中教師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有一個特殊尊敬的級別，一般教師一個星期的工時三十小時，博士級教師工時十七小時。

白山人寫博士論文以外還發表了兩位法國詩人的研究：一是紀堯姆·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詩人、劇作家、藝術評論家，其詩歌和戲劇在表達形式上多有創新，超現實主義的先驅詩人。一是 Blaise Cendrars (1887-1961) 的研究著作。論文著述也發表關於翻譯成俄文的瑞典 19 世紀的詩。還有一本著作關於用俄文寫的義大利與俄國的未來派的詩，在翻譯《紅樓夢》以前還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當中的鏡子所起的象徵作用》的文章，以及一些關於紅學研究的文章。

他說：「我研讀文學史主要是比較文學，不僅是瑞典的，也包括整個歐洲的文學，一直到考博士以前都不知道歐洲以外的文學是甚麼，除了阿拉伯文學裏的《一千零一夜》，那時誰都不知道《紅樓夢》是什麼。五十年代末我在巴黎學習兩年，又在義大利學習兩年才知有《紅樓夢》。所以，我購買 120 回本的《紅樓夢》，作為我自己學中文的第一個課本。」

白山人從小收集郵票，中國郵票的漢字美麗引他好奇。「我學習的歐洲語言很多，當時我想學習一種歐洲以外的語言。」他自學俄語學了幾年。「1960 年代我對俄國文學很感興趣，常常到俄國去旅行，那時候我調查俄國革命時代所出版的關於典範人物與英雄的教科書。」接著又自學中文幾年，「1975 年我到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跟馬悅然教授學習了幾年中文，第二年馬悅然叫我領導一個計畫『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1951 到 1976 年的短篇小說』，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我也研究中國短篇小說裏的典範人物。」

「我七十年代初開始跟馬悅然教授學中文，不僅學習當代的漢語，也學先秦文學與古文。我那時就真的認真讀了《紅樓夢》，我讀了又讀，我很快發現這真的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

馬悅然指出，「白山人的《紅樓夢》書名的翻譯，與眾不同，值得誇讚，白山人翻譯紅樓夢是閨閣之夢，而不是大宅第的 mansions。」白山人說，「進入紅學研究以後我發現周汝昌也對書名有同樣的看法，讓我很高興。我認為周汝昌是中國紅學最偉大的學者。他一輩子研讀小說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最大的希望是《紅樓夢》能有很好的英文譯本，周汝昌接受楊憲益的英文譯文，可是他認為楊先生把書名譯錯了，紅樓指的就是閨閣，這一點我在還沒讀周汝昌以前也發現到了！我也認為曹雪芹自己就是寶玉，作者非常窮困潦倒的在北京寫出這本書，帶有強烈鄉愁，想到自己年輕時候的繁華璀璨。」

「我將《紅樓夢》翻譯成瑞典文的篇幅甚大分為五冊出版，每一冊以『金時代』、『銀時代』、『銅時代』、『鐵時代』、『石時代』命名。我選這些題目是受到公元前七百年希臘詩人赫西奧德（Hesiodo）的看法，依據他把人類社會的進程劃分成越來越衰退的時代的說法，最後一冊回到「石時代」呼應了小說的開始，石頭的魔幻亦象徵人類的想像力和文學的可能，比喻超越了現實走入秘密之徑。」

談到《紅樓夢》人物方面的特色。白山人指出，小說共有 421 個有名字的人物，其中 232 個男性，189 個女性，人數比莎士比亞的所有戲劇的人物還要多 150 人。其中約有 30 人有自己的語言特色，尤其是女人有強烈的個人語言風格，主要是賈寶玉跟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劉姥姥。當你朗讀《紅樓夢》給一名中國讀者聽，他會立即知道這一段是誰講的話。語言風格最特殊的人首選王熙鳳，她的文學修養不高，遠比不上寶玉、黛玉，但她把握自己的話語才能甚強，她也會看是跟誰講話來選擇不同的話語。劉姥姥擁有一般底層老百姓的語言天才，那種鮮亮光脆的語言為整部小說的輝煌成就添加許多光彩。

這本書起碼有 20 個人的命運叫白山人非常感動，像是非常悲慘的賈政，他過分地固守儒教思想，沒有機會瞭解他那非常特殊的兒子，也沒有機會脫離儒教帶給個人與家庭命運的悲劇。據白山人看：「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小說有一點像《紅樓夢》，可是那裏的『魔幻』跟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人類學文化背景比較有關係，至於《紅樓夢》的魔幻成分就是佛教了。」小說裏頭那些看似跟神話之間無關緊要情節，以及糾纏，有著非常強烈的吸引力。白山人採用程高本（程偉元，高鶚，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第 9 版）翻譯。

《紅樓夢》已經翻成十七種語文，最後一種就是世界語。有好幾種英文的譯本，最傑出的譯本當然是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翻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思原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系主任。他翻譯了前八十回，他女婿閔福德（John Minford）翻譯後面四十回，這是很好的翻譯。還有法文版的譯者李治華，他比霍克思的譯文整理出更多註腳，對白山人的幫助很大，得以在許多細節考慮的更周詳。

我問白山人翻譯《紅樓夢》最大的困難在哪裡。他認為應該避免不合時代的字詞。這部譯文的讀者必須要接受十八世紀的中國人講瑞典語，那當然是現代的瑞典語。據他看有兩種翻譯方式的呈現：一種是要盡量保留原文的形式，讓讀者知道是一種陌生的語言所寫的；另一種譯

文要教讀者相信那譯文是用瑞典文寫的。他用的是第二種方法，「我寫進許多註腳來解釋讀者覺得也許難懂的地方。一個中國讀者讀《紅樓夢》的時候，就建立了一種作者跟讀者之間的對話，而翻譯家的責任是創造翻譯家和讀者之間的對話。」

「我讀了好多次《紅樓夢》，我發現曹雪芹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人，很喜歡用反話與讀者講話。他自己說出來，也讓小說主人翁表達他自己的看法，我知道要翻譯《紅樓夢》就必須摹仿他的敘述口氣，最重要的區別是：說真話與說反話！但是一定要讓讀者自己發現，哪一些是真話哪一些話是在說反話。」

另一個對翻譯者來說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翻譯賈寶玉跟林黛玉的詩。林黛玉表達自己感情與思想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詩了。白山人說，雖然馬悅然翻譯了很多中國詩歌，古代的與當代的，然而一個瑞典讀者對於中國詩歌的知識畢竟還是太少了，我就創造了一種「回音室」體例，所用的詞與節奏，在瑞典文當中有著相似的詩意，所以一個瑞典人讀就會立刻聯想到這種詩意，並且能夠依賴這種體例的聯想而能進入詩意的情境。「我想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翻譯家必須『騙』讀者，讓他們相信自己能夠讀懂中國十八世紀的小說。」

我想知道西方的著作有沒有類似《紅樓夢》的作品？白山人說，我認為可能沒有。最接近的也許是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描寫有名的貴族階級以及他們的生活，普魯斯特的審美感受很強，在這本書中所起的文學作用很重要。當然還有歐洲重要的家族小說像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的《布登伯洛克家族》（Buddenbrocks，1901 作品）。主人翁賈寶玉的性格也叫他想起喬依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一位青年藝術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en），此書有作者強烈的自傳性質，描述一個天才男子逐漸成熟而認識到了自己，喬依斯以大量的心理獨白來代替對外客的客觀世界的描寫。還有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的《人類的戲劇》（中文翻譯為《人間喜劇》），他在那部龐大的小說裏將法國社會 1815 年起的所有歷史、政治、社會現象都包括在內，並將自己的小說總結在這一部小說世界裏。像《紅樓夢》一樣，巴爾扎克使用很多不同的語言，白話的、文言的、甚至粗野的都包括在內。還有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1867-1933，193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福爾賽世家》（The Forsyte Saga）。

「如果我們認真面對曹雪芹這位十八世紀的作者，如今看起來很像是一位現代的作家！曹雪芹對於小說創作的結構比西方作家清楚得許多。他是一個無所不知的作者。他也創造了一種『非真實』的世界，讓我們了解到中國的社會裏貴族與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他的小說可說是在『有佛洛伊德以前已經有了佛洛伊德，普魯斯特以前就有普魯斯特。』他用一種極盡輝煌華麗方式描寫了中國式的女性主義的生活。」

漢語悠久的歷史飽含豐富的辭彙，相對之下歐洲歷史包括瑞典的歷史本身是比較短的，我很想知道白山人翻譯以前是否想過瑞典語的辭彙是不是足夠用得上翻譯《紅樓夢》？白山人回答：我的老師馬悅然教授翻譯了五十部中文古代和當代文學的作品，這個成果已經告訴了讀者

大眾，我們瑞典語文足夠豐富。翻譯這樣一部大的中國小說《紅樓夢》，其中大部分語言都是白話文非常現代的，語言對翻譯家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有意思的是，當代的中國人讀《紅樓夢》是那麼容易的，語言與生活是那麼接近，一個瑞典人要閱讀十八世紀的瑞典文著作，是多麼不容易。我閱讀《紅樓夢》要比閱讀魯迅容易的多了。《紅樓夢》仍然有部分是古代的文言，還有儒學以及與宗教有關的道教佛教，這個部分比較不容易，翻譯時需要認真思考。我認為小說裡頭的詩，多半是年輕人寫的。我相信曹雪芹有的時候寫得不太完好的詩，是那些年輕人為賦新詞而作，所以不要翻譯得太好，保留作者在這意念態度上的完整。然而曹雪芹的語言對中國語言的發展，就像但丁、莎士比亞、普希金之於義大利文、英文以及俄文是相同的文化意義。

白山人相信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最後四十回就是高鶚寫的。前後部的區別還是比較大，前八十回南方官話（南京金陵）的影響較多，後頭的官話就比較少用，還有一些語言方面的區別。這是西方與中國學者用語言學的方法比較出來的。

我要求白山人回答假設的問題：要是白山人夢見曹雪芹，可以當面請教曹雪芹。他想說些什麼。白山人說，「我想我會這樣說。第一個問題是：尊敬的朋友，您的小說《紅樓夢》當中的百分之九十，寫了一個豐富而動人的賈寶玉的形象。一名容易感動的青年，一生想追求無上之美的，很特殊的主人翁。我也明白，寶玉從追求無上之美變成聽父親的話考科舉，最後變成信佛出家的和尚，這是小說的結構所需要的。但問題是你認為寶玉的改變會是一個讀者認同接受，並且是可能的嗎？你自己是一個懷疑論者，你怎麼會相信人家會接受這樣的結果，曹先生您既然認同了那個發展，那請問你對佛教有什麼看法，對虛空與空虛有什麼看法。」

「我也想於夢中請問曹雪芹對後四十回的看法？那些是你喜歡或不喜歡的？你究竟寫過一百二十回麼？要是寫過，你寫的最後四十回哪裡去了？你是不是因為害怕被審查或者因為那反映了你自己的生活與看法有自傳性的意義在裡面，還有，林黛玉跟薛寶釵你到底喜歡誰？當然要是那個夢夠長我還要問許多小問題，比如《紅樓夢》裡的女人是否裹腳？最後我要恭喜曹雪芹他寫了那麼偉大的小說，那部小說真的值得得一部諾貝爾文學獎。」

白山人 1998 年退休以後，做了許多準備翻譯的筆記，2000 年 1 月他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整整翻譯三年才做完這個巨大的工作，有時他不得不感覺到疑惑，在瑞典究竟有多少人能讀完三千五百頁《紅樓夢》的譯文，有誰能夠重視這部偉大的著作給他寫篇像樣的書評，許多次他在這樣的焦慮重又在紙堆當中振作起來，直到書稿完成他萬分肯定他的人生最快樂的生活就是翻譯《紅樓夢》的那三年。由於馬悅然翻譯完他喜愛的中文著作常說那幾天他的心就留在書裏的世界，他整個心空蕩蕩了。我問白山人翻譯完成以後的心情，他的回信寫著：「我的內心感到無比的輕鬆，我終於可以全然放鬆心情再度閱讀馬悅然翻譯的《水滸傳》、《西遊記》享受他所有的譯文跟註解。」

馬子曰（馬悅然曰）俳句一首：

曹君之大觀
鏡中的花朵而已
可多麼完美！

馬悅然翻譯《水滸傳》、《西遊記》以後，瑞典有些知識份子像是《每日新聞》總編輯也問過馬悅然為什麼不翻譯《紅樓夢》？馬悅然說擔憂自己找不出足夠的「浪漫主義」的語言。馬悅然很早就知道白山人這一生都愛著《紅樓夢》，每次馬悅然見到他就勸他：「你翻譯《紅樓夢》吧！」他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他學問很大可他總說：「不行，不行。」忽然有一天白山人就寄來了一本譯稿給馬悅然看，叫馬悅然非常高興。白山人《紅樓夢》在遠東圖書館發表的那一天，白山人逼問馬悅然：「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他非要知道馬悅然為什麼要推薦學院給他獎、得獎那天在《瑞典日報》還發表一篇整版的書評。馬悅然說，因為你做了這麼好這麼大的文學貢獻。他拒絕接受這個回答，臉上堆滿了懷疑。他說：「我不一定有那麼好。」馬悅然說：「我對你的好，不僅是對你好對《紅樓夢》好，當我做這些事情也是為了報答所有像你、像我的高中老師那樣的人，他們懷抱一種向全世界求知的欲望，他們有古典精神對學術紀律的要求，他們像你一樣值得在大學當個大教授，卻在高中教學生一種最優美的古老語文，我高中的拉丁文老師還有其他的好老師就是像你這樣的人。那樣的人只活在另外一個世界，現在已不存在了。」

現在丹麥的女漢學家易波德翻譯《金瓶梅詞話》一年出版十回譯本，十年可出版完成。我很高興北歐擁有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四大名著的譯本，這可是小小的北歐之偉大驕傲！